

François Kersaudy

DE GAULLE ET CHURCHILL

戴高乐与丘吉尔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K335.357/31

498810

与丘吉尔

[法] 弗朗索瓦·凯索迪 著

秦志明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FRANÇOIS KERSAUDY
DE GAULLE ET CHURCHILL

根据法国PLON出版社1982年2月版译出

责任编辑：周琪媛

封面设计：左彦文

戴高乐与丘吉尔

〔法〕弗朗索瓦·凯索迪著

秦志明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6印张 40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 7-80049-418-7 / I · 68 定价：7.50元

内 容 提 要

戴高乐与丘吉尔是众所周知的二次大战期间叱咤风云，声名煊赫的二位著名历史人物。但是由于两人看问题的方法不同，性格迥异，因此在长期的交往中，在处理两国关系的各种问题中，经常发生一些矛盾，龃龉，甚至对抗、诅骂，但是他们从两国关系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下，终于使矛盾得到了辩证的统一，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在西方历史人物的关系上，都是很突出和少见的，也是很有意思的。

本书作者首次全面公正地描述了从1940年6月到1965年期间，两位风云人物来往过程中所发生的真实故事，比如书中对二战期间给自由法国和其重要盟国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以及促使两国之间互相不理解的一些阴谋手段都有所揭露。本书引用的历史资料翔实丰富，分析也比较中肯合理，语言则生动流畅，幽默风趣，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及两人之间交往的本来面目。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可以作为历史资料来读，又可以作为名人轶事来欣赏。

目 录

| | |
|--------------------|---------|
| 引言 | (1) |
| 第一章 亲法与仇英 | (18) |
| 第二章 风暴 | (31) |
| 第三章 覆舟 | (44) |
| 第四章 洛林十字 | (80) |
| 第五章 联盟 | (109) |
| 第六章 初次冲突 | (146) |
| 第七章 “所谓的自由法国人” | (175) |
| 第八章 背信弃义的阿尔比雍 | (201) |
| 第九章 权宜之计 | (235) |
| 第十章 强迫婚姻 | (259) |
| 第十一章 团结之路 | (292) |
| 第十二章 承认 | (322) |
| 第十三章 盟国军政府或法国临时政府? | (344) |
| 第十四章 最漫长的夜晚 | (385) |
| 第十五章 解放 | (413) |
| 第十六章 英国的死敌 | (450) |
| 第十七章 融洽无间 | (489) |

引 言

1911年10月担任英国海军大臣的那个人，可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出身显赫。他父亲短暂但光辉的一生，在当时的大不列颠是尽人皆知的。他作为青年军官参加过印度、苏丹和南非多次战役，也名闻遐迩。他还是个光辉的演说家和天才的作家。最后，他还有过10多年政治活动的经历：先是保守党、后是自由党的下议院议员，又担任过殖民副大臣、商务大臣和内务部长。凡是在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最初几年和他相识或合作过的人，都知道他具有好些非凡的优点。比如他在身心两方面的高度勇敢精神，无限的精力，惊人的想象辅之以出众的记忆，对国家、对组织的赤胆忠心，对重大事件满怀激情和有朝一日能参与其事的强烈愿望。1911年，欧洲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样的事件果真即将来临，这就为这位新上任的海军大臣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温斯顿·丘吉尔一进海军部，就不失时机地使海军对即将爆发的战争作好思想准备。当丘吉尔看到这场战争最终已不可避免时，就立即以惊人的激情决心行动起来。1914年7月28日，不待英内阁作出决定，他下令海军第一舰队进入北海军港待命。5天之后，大不列颠进入战争。陛下政府的成员都被海军大臣在执行任务中的丰富想象和快速行动惊呆了。从此，温斯顿·丘吉尔战斗

不息，直至大战结束和战后的一个时期。

自1914年10月起，海军大臣接过了全国空防指挥权，向法国派去了3个中队海军航空兵，1个炮兵营和许多装甲车。他6次穿越拉芒什海峡去视察防线，鼓励士气，最后在被围的安特卫普登陆，并在那里致电首相，要求准许他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以便亲自指挥安特卫普的保卫战……

回到伦敦后，丘吉尔竭力使英国的战略具有坚决进攻性质。凡是能使协约国在战场上取得好处的计划、创见或新的主动行动，海军大臣都毫不延迟地要拿来加以研究，并且不被采纳就决不罢休。1914年11月，丘吉尔亲自组织了几次由海军航空兵实施的对弗里德里希港齐普林飞机库的空袭。几周之前，他还向同僚们和军方负责人强调过，必须制造一些“装有小型装甲掩体和履带的拖拉机”⁽¹⁾，这些最早期的坦克后来就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在海军部制造出来的。在此期间，丘吉尔还参与制订了一项进攻德国博尔库姆岛的计划。但这项计划很快被放弃，转而采取了另一项更大胆的计划：强攻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以接应俄国人。丘吉尔经过长时间的考虑，认为这是使法国北部已经陷入泥浆和战壕中的战争得以缩短的最好办法。可惜，海军在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阵地以及随后在格利博卢半岛的登陆行动都先后失败了。为这次行动的成功尽了一切努力的温斯顿·丘吉尔不得不对他的失败承担责任，并被迫辞去了海军部的职务。

1915年5月后，丘吉尔被贬官往兰开斯特公爵郡的总理公署去担任一份光荣的闲差。他每天除了在当地的官吏任命书上签签字之外，就无所事事。但是，要使他长期置身于战争之外是不可能的。不久，他就接二连三地向首相、陆军部和他在海军部的继任人提出了无数的备忘录，建议必须巩固东部战线，改善坦克

生产，创建一支独立的海军陆战队，重开达达尼尔海战，甚至建议“由英国用日本枪支装备15万俄军，以加强英法联军，立即向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开战”⁽²⁾……

当丘吉尔得知英政府准备不顾一切从达达尼尔海峡撤退时，他辞去了总理公署的职务，从1915年11月起重返法国前线，以少校军衔，在英军掷弹兵中服役。在德军炮火的不断轰击下，他在弗朗德勒地区泥泞的战壕里战斗了6个月。和丘吉尔在一起战斗过的人都认为他对战争十分迷恋，并且毫不畏惧艰险。⁽³⁾1916年春，丘吉尔少校重返下院，对政府犹豫过多的战争政策提出批评。但是各个政党都不支持他，议会也是。自达达尼尔海战失败以来，他成了报界不断攻击的目标。这样，他不得不等了14个月，才被劳合·乔治政府任命为军需部长。但是正是在这个岗位上，他得以重新施展他众所周知的惊人才能。这位新军需部长不仅不满足于把弹药和军事装备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把坦克的制造发展到很大的规模，对各个战场不断进行巡视，向首相提出大量建议和忠告，而且还重新制订了一系列大胆的战略计划，以加速德国的失败，尽管这些计划并不总受到陛下政府的重视——有时这倒反而更好——但丘吉尔的非凡毅力和主动精神，直至战争结束都始终是劳合·乔治政府一张宝贵的王牌。

和平恢复后，丘吉尔出任陆、空军部长。在此任上，他指挥英军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作过战。后来，在当了三年殖民部长后，他参加了保守党，成了财政大臣。但1929年后，他因与保守党在印度问题上发生争执，于是在1931年退出了保守党的影子内阁。从此，直至30年代末，丘吉尔独自一人奋战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然而欧洲局势的演变很快使他有去为了一项新的事业效劳，这就是保卫大不列颠、保卫整个欧洲文明、反对德国纳粹的

致命危险。

确实，正当极权主义思潮在欧洲不断发展时，丘吉尔比他的同志们更早地就意识到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实行的裁军政策将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首相1931年6月29日在下院声称，他将努力使欧洲军备进行“全面裁减”，然后使大不列颠的裁军“走得更远”。温斯顿·丘吉尔立即表示反对，指出：大不列颠的处境已岌岌可危，她的军队已“裁减到了最低限度”，成了一支“改良的警察部队”，空军只等于法国的八分之一了。(4)

随着阿道夫·希特勒即将登上极权的宝座，丘吉尔对麦克唐纳和平主义政策的批评也更加激烈。1933年3月23日，丘吉尔指出：近4年来，麦克唐纳的外交政策使大不列颠变得更软弱、更贫穷和更易受攻击，从而使大不列颠更加接近战争了。丘吉尔还把日内瓦裁军会议比喻为一出“庄严而冗长的滑稽剧”。(5)同年，当约翰·西蒙爵士发出关于缔结一项国际裁军协议的号召时，丘吉尔反驳说：大不列颠的裁军“已裁到了深渊的边缘。再裁，我看只能裁到深渊中去了”。(6)1934年7月，他用了一句既精辟又讽喻的话对裁军作总结说：“近年来，我们眼看着国家间关系在不断变坏，敌对情绪在不断发展，军备储存也在飞速和持续地增长，但是尽管如此，各种巧言舌辩、迷惑人的演说、高雅的情谊和丰盛的宴会还是层出不穷、没完没了。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特点吧”。(7)

从这时起，丘吉尔不断呼吁政府，要加大大不列颠的防务，加倍甚至再加倍地扩充空军，建立国防部和补给部，使海军现代化，加大大不列颠与大陆之间的联系，支持国际联盟。他还在无数的演说和文章中，谴责德国的种族清洗和迫害、德国的再武装、莱茵河地区的重新军事化、并吞奥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和威胁波兰，在更多的文章和演说中，他还论证了德国正在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再武装。1934年，他警告政府和同胞们说，德国的空军已等于英国的三分之二了。1935年，又警告说已与英国相等了，1936年已超过皇家空军50%，最后到了1938年，正好是英国的2倍。丘吉尔还巧妙地把他的辩才、劝说和冷嘲热讽结合起来，不懈地揭露英国在重整军备方面的拖拉作风，并定期向议员们和公众舆论发出呼吁。1936年11月，他在下院的一次讨论国防预算的会议上，发言说：

“海军大臣在昨晚的演说中对我们说：‘我们经常在对局势进行观察。’并向我们指出：局势实在令人难以捉摸。我可以肯定这是真的。对局势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政府就是不拿出决断来，或者说，政府不能促使首相拿出决断来。这样，政府就不能不实行一种奇特的政策：决心处在不决断的状态中，决定不作出决定，坚定地听任事物去自由发展，坚信局势的变幻莫测，坚强地扎根在无能中。”(8)

但一切均属徒劳。拉姆齐·麦克唐纳无可挽回地坚持他的和平主义道路。他的后任斯坦利·鲍德温害怕重整军备会损害保守党的选举地位。内维尔·张伯伦也认为通过与独裁者的直接洽谈，可以避免战争，这样前后三位首相能拒绝对他们政策的批评，否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失职，认为那些对他们不利的军备统计数字是不可靠的。他们还把丘吉尔说成是一个爱说大话、空话和好战成性的黄口小儿。因此在30年代，丘吉尔始终被排斥在政府之外，他在议会的环境也很孤立。他的很有说服力的批评意见常受到不了解当时危机严重性的议员们和公众舆论的赞赏、嘲笑、漠然视之等兼而有之的对待。如议员菲利普·盖达拉后来写道：“丘吉尔先生的谆谆告诫成了像是清真寺里的穆安津

在按时向教徒们报告祈祷时间那样的习以为常的东西了。”(9)

这段漫长的失意期对丘吉尔来说，是够痛苦的——莫顿少校甚至说他好像一个“砸碎了玩具的小孩”(10)但丘吉尔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也未完全被孤立。一个原因是，他始终相信他对过去的事态和未来的后果的认识是正确的。从1921年起，他就警告他的同胞们说：“现在引起德法分裂的新仇旧恨和恐惧心理，如不警惕，其结果必将导致刚刚结束的大战，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重新爆发。”(11)在11年后的1932年，他说了更有远见的如下这段话：“所有这些在德国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往来的一群群体格健壮的德国青年们，他们都怀着甘愿为祖国牺牲的愿望，要求得到武器。请相信我，他们一旦得到了武器就会要求归还失去的领土和殖民地。这不可避免地将使我提到的所有国家，甚至还有一些我没有提到的别的国家，从根本上受到震撼，甚至被灭亡。”(12)

丘吉尔确已洞察了希特勒的真正意图及其全部内涵。而且如同在1915年时一样，他毫不怀疑自己有能力动员起国家的一切力量并引导国家去经受即将来临的风暴的考验。其他许多人也都赞同他的这个信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这个表面上孤立的人有联系的公民越来越多。其中第一个就是莫顿少校。他与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相识。现在莫顿少校在一家“工业情报中心”工作。这是为了监视德国工业发展而设置的一个机构。因此不久莫顿就向丘吉尔提供了许多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十分确切的资料和统计数字。(13)从1935年开始，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拉尔夫·威格拉姆也向丘吉尔提供了外交部所掌握但被政府所忽视的许多有关德国情况的资料。几个月之后，海军大臣、海军上将查特菲尔德开始与丘吉尔通信，详细地谈到了皇家海军存在的缺点与问题。(14)从1936年5月起，皇家空军训练中心主任托尔·

安德森中队长向丘吉尔提供了英国空军在人员、装备和训练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情报和数据。几个月之后，皇家坦克兵团总督察霍巴特准将主动要求与丘吉尔商谈重大机密问题。自然，所有这些情报都被丘吉尔用来在下院揭发政府在国防政策方面的疏忽大意。

其他一些军界人士也向丘吉尔通报了一些不很机密的情况，并力图使丘吉尔能有施展他才华的机会。如新任空军部长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于1935年7月曾要求斯坦利·鲍德温首相同意让丘吉尔去空防研究委员会工作。⁽¹⁵⁾鲍德温同意了。这样，丘吉尔就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从而使他有可能获得许多有关空防方面的情报，以及委员会本身存在的缺陷。在随后的几年中，好几位高级官员都竭力向他证实：英国重整军备已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进行。比如，参谋总长就向他通报了坦克制造的计划。空军部长则邀请他去参观新的雷达设施。⁽¹⁶⁾丘吉尔对此总是很感兴趣，但他也给他们指出了许多缺点。诸如：在坦克生产中还缺少半重型坦克，雷达工厂和雷达站的空防还要加强，以对付空袭。总之，仰仗这些情报和参观访问，丘吉尔在了解国家的资源和防务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知识。

丘吉尔在漫长的失意时期之所以未被真正孤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许多政敌，其中包括在11年间尽可能把他排斥在政府之外的几位首相，都从未忽视温斯顿·丘吉尔具有的许多无可否认的优点，而且这些人也总是这样见之于行动的，比如1929年，当莫顿少校向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请示，对丘吉尔要求了解有关防务情况的某些机密材料，应该怎么办？首相回答说：“把他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让他了解全部情况”。首相甚至把这个意见用书面记录下来。首相的后任们看了，也都同意这个意见。⁽¹⁷⁾

尽管他们明知这些机密情报将被丘吉尔用来揭露他们政策中的缺点，他们也知道这样的让步将使他们付出很大代价，但是这样的做法始终未被取消。原因很简单：在唐宁街，人们都很了解丘吉尔，人们也很清楚一旦战争爆发，丘吉尔的合作将是一张无可估价的王牌。1935年11月，斯坦利·鲍德温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万一战争来临——谁也不能说不会来——我们就有了一位候补的战时首相。”(18)即使是把丘吉尔看作是“一位很难相处的同僚”(19)的张伯伦，也毫不怀疑战争将把丘吉尔推向前台。“战争越临近，他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张伯伦在1939年夏这样写道。(20)

可是张伯伦直至最后时刻仍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甚至对朋友们说：“让温斯顿·丘吉尔进入政府，等于向柏林宣战。”(21)这样到了1939年夏，当时已65岁的丘吉尔怀着惊心动魄的心情看到了欧洲和平已遭到致命的危险。在35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已取得了比英国历史上任何首相更丰富、更多样的经验。在10年间，他在没有任何政党的支持下，努力使他的国家不致在侵略者面前被解除武装。在30年间，他确切地掌握了国家在资源和防务方面的状况。因此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有这种毅力、想象和勇敢精神，去把一切都鼓动起来。可是，当希特勒准备入侵波兰时，温斯顿·丘吉尔还只是下议院的一个普通议员。

× × × ×

1912年10月，一位22岁的少尉刚从圣西尔军校毕业。他的一位教官在他的学员手册中写道：“除了身材高大，其他均平平”(22)这个评语写得很不实在。因为在夏尔·安德烈·约瑟夫·戴高乐身上没有任何“平平”的东西。一些比较客观的教官以及和他同届的所有同学都认为他具有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出众的记

忆力和对军人职业的酷爱。另外，他从他的严肃而又博学的父亲亨利·戴高乐那里还继承了“某种法兰西意识”，也就是对祖国的光辉历史和现实利益充满着崇敬和爱慕之心。

戴高乐后来自己写道：“总之，我毫不怀疑法国将经受巨大考验。生命的意义在于有朝一日能为她作出自己的重大贡献。我相信我会有这个机会的。”〔23〕

1913年，戴高乐少尉被编入驻守在阿腊斯、由菲利普·贝当上校指挥的步兵第33团。贝当当时还是个不出名的军官，他在战略上的异端思想预示着他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前程。*1914年8月2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戴高乐升任中尉，在步兵33团1营服役。

在默兹省的血腥战场上，在香槟地区的泥泞战壕里，在凡尔登的断垣残壁间，戴高乐中尉（以后又升为上尉）作战非常勇敢，曾3次负伤。第三次是在1916年3月2日，在图奥蒙前线，他率领连队与敌人拼刺刀时，受了重伤。在法国，人们以为他已经牺牲了。其时已成为法军中显赫人物的贝当将军为他颁发了死后的荣誉勋位勋章，并对他进行了热烈的表彰。**但戴高乐上尉没有死，而是被德国人俘虏了，并在德国的战俘营里一直呆到战争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流行的军事理论，认为步兵的进攻是主要的战略因素。贝当上校则不断强调，坚固设防的阵地和炮火准备在战略主动中具有关键作用。

**“连长戴高乐上尉，才德高尚。在全营因遭敌猛烈空袭而伤亡重大时，连队也四面受敌攻击。戴高乐连长为了维护军队荣誉，率领全连战士勇猛出击，与敌进行肉搏战，戴高乐上尉在血战中，英勇阵亡，实为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楷模。”〔24〕

戴高乐在被关押在弗里特伯格和英戈斯塔特的俘虏营期间，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在多次试图越狱均未成功之后，他以极大的专心关注着战争的演变情况，向难友们作过多次关于最新军事形势的报告。*其中最吸引他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从1917年春起，坦克开始参加战斗的行列。

1918年的停战结束了戴高乐被强制流放的生活。1919年5月，他与波兰军队共同对苏联人作战，然后在华沙附近的伦贝尔士夫军官学校教授步兵战术。1921年末，他被召回法国，在圣西尔军校教授军事史。1922年，戴高乐进入高等军事学校。他在那里，并非无声无息。因为当时在这所学校教授的几乎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教材：作战必须在事先准备好的阵地上，在炮兵强大火力的支持下进行，而且战略思想也几乎总是单纯防御。戴高乐并不掩饰他对这些理论的怀疑，这就使他在教官面前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此，当1924年戴高乐上尉从这所学校毕业时，尽管成绩优异，仍被派往远离巴黎的莱茵军参谋部工作。

幸而这位不太一般的年轻上尉得到了一位高级军官的庇护。这位高级军官就是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菲利普·贝当。自1913年以来，贝当对戴高乐的杰出才能一直十分欣赏。戴高乐对高等军事学校陈旧理论所持的态度，使贝当回想起自己单枪匹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流行的错误理论进行长期斗争的情景。1925年秋，戴高乐终于被调到美因兹最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办公室任职。委员会的副主席就是贝当元帅自己。这可不是一份闲差，但至少可使戴高乐更加接近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后来，戴高乐又在特莱

*在俘虏中，还有日后的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和本书中将要多次提到的卡特鲁少校。

夫地区担任第19轻装营营长，并在利凡得地区的参谋部任职2年之后，以少校军衔被调回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任职6年。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1932年至1937年，先后变换了14届内阁。我参与了所有有关国防方面的政治、技术和行政事务的研究工作。……通过我所做的工作、我参与讨论的决定和我与各方面的接触，我了解到了我国广博的资源状况和国家的弱点所在。”(25)

戴高乐中校运用他敏锐的眼光，确实看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情况：政府几乎完全瘫痪；宪法缺陷和议会阴谋带来的后果；军队的陈旧、官僚、僵化；军事理论、训练和装备自1870年以来就很少变化，自1918年以来变化更少；最后还有一个盲目坚持防御战略和坚固设防信条的参谋部。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阿道夫·希特勒正进行大规模重新武装、怀有明显意图准备将凡尔赛和约踩到脚下去的时刻。因此，如果法国不能及时采取措施恢复有利于自己力量的平衡，她必将面临致命的危险。但是怎样才能得到解救呢？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观察之后，戴高乐中校写了一本于1934年5月出版的题为《向职业军队迈进》的书，(26)提出了一项详尽的解决办法。

这是一本各方面都很杰出的书。使用的法语十分简洁和古朴。他一开始就论证了法国东北部边界的极易受攻击性。多少年来，这条边界线一直是入侵者得以直捣法国心脏的一条最近便和最直接的通道。

“篱笆上的这个大漏洞是祖国千百年来的弱点所在。……在这条致命的大道上，我们刚刚埋下了祖国三分之一青年人的忠骨。……这个防卫如此不严的国家，至少应该有所警戒了吧？然而20个世纪来的回答是：否！”(27)

20世纪的情况也不例外。法国仍想依靠单纯防御来保卫自己。在危急时刻大规模募兵的制度已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服役期一再缩短，在不到10年间已从3年缩短到1年。国家机构的软弱与法国人内部明显的分裂倾向，使这幢已经不稳的大厦更加摇摇欲坠。那么，解救的办法何在呢？

戴高乐回答说：“建立一支职业军队”。一支由10万名年轻、忠实、可靠的人组成的军队。这是一项十分激动人心的任务，它足以使法军恢复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中失去的机动性和战斗力。这种坚决进攻型的战略手段是：由6个新型的装甲化、履带化和完全机械化的师，组成法军的尖刀部队。每个师又由3个旅组成：第一旅配备500辆装甲坦克，以攻克敌阵地为目标；第二旅是机械化步兵旅，任务是占领阵地；第三旅是炮兵旅，目的是掩护其他两个旅。全师还有一个侦察团，若干个工兵营、通信营和伪装营的支持。总之，这是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具有强大的机动性、杀伤力和突破任何防线能力的精英部队。它是能够在危险时刻，保卫我们脆弱祖国的一把利剑！法国必须毫不迟疑地获得它。

戴高乐中校不遗余力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他的事业得到了一些忠实朋友的帮助。如爱米尔·梅耶中校、吕西安·纳香上校和让·奥比丹律师。在议员中，他也有好几位合作者。如马赛尔·德阿·菲利普·塞尔、莱奥·拉格朗日。某些右翼和左翼报纸也支持他，如《巴黎回声报》、《时代报》、《秩序报》。

*在这些建议中，实际上并无任何新东西。埃蒂安纳上校从1914年起（当时坦克尚未出世），就提出过类似建议，要求制造400辆装甲车。战后，法国的埃蒂安纳和杜门克将军、大不列颠的富勒将军和利德尔-哈特上尉改进了坦克战的理论。戴高乐将军受到了他们的启发，德国人也是。